



梅花香自苦寒来

# 陳忠實 自述人生路

陈忠实 / 著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中国作协副主席  
当代著名作家  
文化大家陈忠实  
自述成长路寄语青少年

014038050

K825.6  
1104

陈忠实 / 著

陳忠實 自述人生路

梅花香自苦寒來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justp.com>  
中国 · 武汉

九



北航

C1723742

K825.6  
11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梅花香自苦寒来：陈忠实自述人生路 / 陈忠实 著. -- 武汉 :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609-9511-3

I . ①梅… II . ①陈… III . ①陈忠实 - 自传 IV .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7033号

梅花香自苦寒来：陈忠实自述人生路

陈忠实 著

策 划：许晓善

责任编辑：许晓善

封面设计：SOMA

责任校对：白 翱

责任监印：张贵君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010）84533149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 x 1230mm 1/32

印 张：7

字 数：150千字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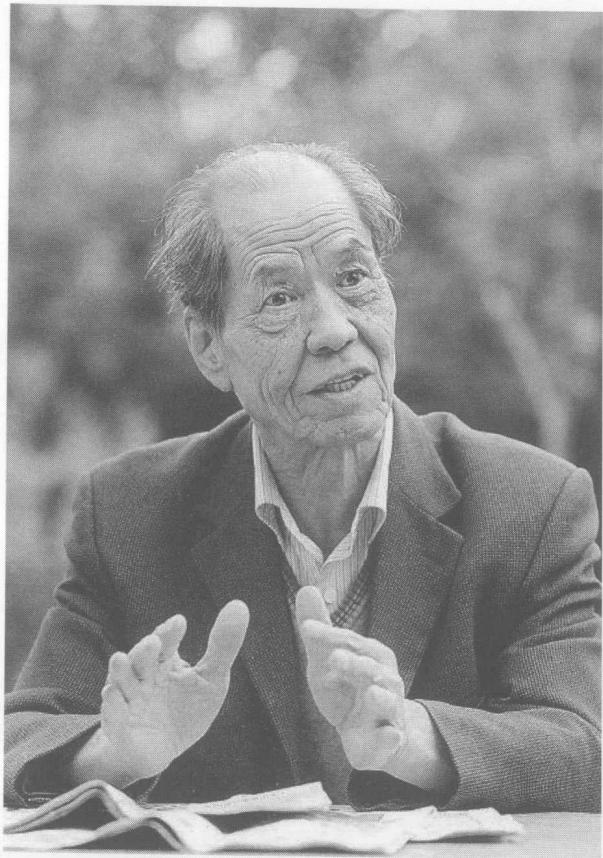
定 价：29.8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有思想 有文化

# 目录

---

① 我的文学生涯	/ 1
② 三十年，感知与体验	/ 7
——与邢小丽对话	
③ 1980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 1
④ 借助巨人的肩膀	/ 29
⑤ 皮鞋·鳝丝·花点衬衫	/ 41
⑥ 回家折枣	/ 47
⑦ 父亲的树	/ 51
⑧ 白鹿回到白鹿原	/ 59
⑨ 《白鹿原》的创作经过	/ 61
⑩ 我的第一次投稿	/ 73
⑪ 别路遥	/ 79
⑫ 黄帝陵，不可言说	/ 83
⑬ 文学的信念与理想	/ 85
⑭ 再说死亡	/ 93



15 在自我反省中寻求艺术突破  
16 『非典』不是虎烈拉 / 145  
17 重读《家》一个时代的标志  
——写在巴金百岁华诞

18 最初的晚餐 / 151	19 拥有一方绿荫 / 155	20 陪一个人上原 / 159	21 与军徽擦肩而过 / 165	22 也说中国人的情感 / 175		
23 生命之雨 / 181	24 三九的雨 / 187	25 突破自己 / 191	26 晶莹的泪珠 / 197	27 原下的日子 / 205	28 六十岁说 / 213	29 编辑感言 / 217

/ 147 / 97



# 1

## 我的文学生涯

Wo de wenxue shengya

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听说我的一位老爷（父亲的爷爷）曾经是私塾先生，而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我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入学，直到1962年高中毕业回乡，之后做过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乡（公社）和区的干部，整整十六年。我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有些了解，是这段生活给予我的。直到1978年秋天，我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我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还是决定离开基层行政部门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以便皈依文学。1982年冬天，我调到省作协专业创作组。在取得对时间的完全支配权之后，我几乎同时决定，干脆回归老家，彻底清静下来，去读书，去回嚼二十年里在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蓄，去写属于自己的小说。我的经历大致如此。

我在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文学作品，尚不知世有“作家”和“小说”。上初中时我阅读的头一本小说是《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再熟识不过的。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也是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生活的照片。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的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是带有本性的。我随之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

理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也就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卷……所有这些震撼人心的书籍，使我的眼睛摆脱贫开家乡灞河川道那条狭窄的天地，了解到在这小小的黄土高原的夹缝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父亲自幼对我的教诲，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人要本分啦，勤俭啦，就不再具有权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的规范，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一种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忍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父亲对我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个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种庄稼， he 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农业是最合适的。开始我听信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我不能过像阿尔青（保尔的哥哥）那样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搞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而我面对的现实是：高考落第。我们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很使一些供给孩子读书的人心里绽了劲儿。我的压力又添了许多，成为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回到乡间，除了当农民种庄稼，似乎别无选择。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这实际上无异于冒险。我阅读过中外一些作家成长道路的文章，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文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当中，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要想比常人多有建树，多有成就，首先要比常人付出多倍的劳动，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我比较切实在确定了



自己的道路，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静下心来，努力自修，或者说自我奋斗。我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学”领到毕业证了。结果呢？我经过两年的奋斗就发表作品了。当然，我忍受过许多在我的孩子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艰难和痛苦，包括饥饿以及比鼓励要更多的嘲讽，甚至意料不到的折磨与打击。为了避免太多的讽刺和嘲笑对我平白无故带来的心理上的伤害，我使自己的学习处于秘密状态，与一般不搞文学的人绝口不谈文学创作的事，每被问及，只是淡然回避，或转移话题。即使我的父亲也不例外。

我很自信，又很自卑，几乎没有勇气拜访求教那些艺术家。像柳青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尽管我是他的崇拜者。我在爱上文学的同时，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着天才的极大差别。这个天才搅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应，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确信自己属于非天才类型。尤其想到刘绍棠戴着红领巾时就蜚声文坛难以理解的事实，我甚至悲哀起来了。我用鲁迅先生“天才即勤奋”的哲理与自己头脑中那个威胁极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终于坚持不辍。如果鲁迅先生说的不是欺骗，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我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是散文《夜过流沙沟》，1965年初刊载于《西安晚报》副刊上。第一篇作品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成为大手笔，但作为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我确信契诃夫的话：“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我不敢确信自己会是一个大“狗”，但起码是一个“狗”了！反正我开始叫了！1965年我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散文，虽然明白离一个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可是信心却无疑地更加坚定了。

1978年，中国文学艺术的冻土地带开始解冻了。经过了七灾八难，我



总算在进入中年之际，有幸遇到了令人舒畅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初做作家梦的时候，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想象得很神圣，很神秘，也想象得很浪漫，及至我也过起以创作为专业的生活以后，却体味到一种始料不及的情绪：寂寞。长年累月忍受这种寂寞，有时甚至想，当初怎么就死心塌地地选择了这种职业？而现在又别无选择的余地了。忍受寂寞吧！只能忍受，不忍受将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忍受就是与自身的懒惰作斗争，一次一次狠下心把诱惑人的美事排开。当然，寂寞并不是永久不散的阴霾，它不断地会被撕破或冲散，完成一部新作之后的欢欣，会使备受寂寞的心得到最恰当的慰藉，似乎再多的寂寞也不算得什么了。尤其是在生活中受到冲击，有了颇以为新鲜的理解，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哲理的时候，强烈的不可压抑的要求表现的欲念，就会把以前曾经忍受过的痛苦和寂寞全部忘记，心中洋溢着一种热情：坐下来，赶紧写……

小屋里就我一个人。稿纸摊开了，我正在写作中的那部小说里的人物，幽灵似地飘忽而至，拥进房间。我可以看见他们熟悉的面孔，发现她今天换了一件新衣，发式也变了，可以闻到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旱烟味儿。我和他们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他们向我诉叙自己的不幸和有幸，欢乐和悲哀，得意和挫折，笑啊哭啊唱啊。我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现实世界里我所见过的一切，然而又与现实世界完全绝缘。我进入这个世界里，就把现实世界的一切忘记了，一切都不复存在，四季不分，宠辱皆忘了。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物在一起，追踪他们的脚步，倾听他们的诉说，分离他们的欢乐，甚至为他们的痛心而伤心落泪。这是使人忘却自己的一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只能容纳我和他们，而容不得现实世界里的任何人插足。一旦某一位熟人或生人走进来，他们全都惊慌地逃匿起来，影星儿不见了。直到来人离去，他们复又围来，甚至抱怨我和他聊得太久了，我也急得什么似的……

我在进入44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50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



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50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恰在此时由《蓝袍先生》的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珍惜50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当我在草拟本上写下《白鹿原》的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里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塬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这是1988年4月1日。在我即将跨上50岁的这一年的冬天，也就是1991年的深冬，《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最后的归宿。我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塬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烟云，终于要回到现实的我了。



# 2 三十年，感知与体验

## ——与邢小丽对话

Sanshinian ganzhi yu tiyan  
Yu xingxiaoli duihua

邢小丽：新中国成立到明年就六十年了，前三十年政治运动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奔小康、建设和谐社会。你的人生经历了这个全过程，你是一位亲历者，是一个过来人，我想请你从你的切身体会，或者从一些生活细节，谈谈你的生活感受，说说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沧桑巨变。

陈忠实：我只说一件乡村住房的生活事象。

依我生活了大半辈子的那个村子（我直到50岁出头才搬进西安）为例，解放时37户人家，到“文革”发生时的17年间，已扩大到有近50户人家的村子，只有3户盖起了宽大的两边流水的大瓦房。平常人家省吃俭用积攒多年，能盖起一边流水比较窄小的厦屋，都是全村人羡慕的大事，可以想见那3户盖起大瓦房的主人在村民中间的影响了。然而，就我亲历的感觉，村里人的反应比较冷淡。原因很简单，那3户人家建造大瓦房的举动，是绝大多数人家可望不可及的太遥远的事，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很清楚那三户人家，他们中一户人家有一个在地质勘探队的儿子，另一户人家有一个在煤矿下井挖煤的儿子，都是工人这个阶层收入较高的工种，挣下钱都寄回老家了。20世纪50年代建筑材料很便宜，他们很轻易地盖

起了让大部分公社社员可望不可及的大瓦房。只有第三个盖起大瓦房的主户是地道的农民。他在“三年困难时期”来临的时候，把另一个村子扔掉不种的一小块土地悄悄地栽上了红苕，获得全村人眼馋的收成，又恰好遇到普遍饥饿的非常时期，红苕的市价超过正常年景里麦子的价格。他仅仅凭着这一年捞得的外快，就盖起三间大瓦房。其余所有村民，都依赖着在生产队挣工分过日子，能吃饱且不欠生产队透支款就不错了，盖房谈何容易。即以我家来说，我哥在乡镇企业工作多年，才盖起两间土坯砌墙的厦屋。我和父母还住在祖传的老屋里，每逢下雨就用盆盆罐罐接漏水。别说盖新房，连修补旧房的资金也没有。一个基本事实摆在这个小村子的编年史上，17年里，完全依靠公社体制生活的农民，没有一户能盖起一间瓦房，已经不是谁有本领谁无本领的事了，而是在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之中，任谁都不能盖起三间大瓦房来，且不作深论。

这个村子实行生产责任制是1982年秋天，到80年代中期，不过四五年时间，形成了一个盖新房的高潮，本村和邻村的匠人供不应求。谁家和谁家不做商量，一律都是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或是水泥预制板的平顶大房子，并且开始出现两层小楼房，传统了不知多少年的厦屋没有谁再建造了。也是在已经潮起建造新房的颇为热闹的1986年春天，我也盖起了三间平顶新房。曾经很得意，尽管是用积攒的稿酬盖房，心理颇类近高晓声笔下造屋的李顺大。20多年过去，我祖居的这个小村子，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二层小楼比比皆是。我想着重说明的一点，这个小村子处于地理交通环境中的一个死角，且不说商品经济的大话，农民进行小宗农产品交换都很不方便，比起那些环境更方便的村子的农民，还显得后进一截。尽管如此，较之公社化体制下的生活状态，也可以说是超出想象的好了。

我的直接经历的生活演变引发的感慨，不是通常的理论阐释所可代替。我上初中的1955年冬天，我的村子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建制。我记着把黄牛交给农业合作社集体饲养以后的父亲坐卧不宁的样子，给黄牛添草、拌料、饮水、垫圈已成生活习惯的父亲突然闲下来，手足无措、百无聊赖。我

不仅不以为然，甚至觉得他思想落后。我刚刚在中学课堂上接受了老师宣讲的“集体化是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新鲜理论，不仅完全接受完全相信，而且充满了对明天的美好想象。今天想来，我自小所看见所经历的农家生活的艰难，是渴望改善的基础性心理，很自然地相信老师宣讲的理论了。从初中念书到高中毕业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尤其是在基层乡村人民公社工作的十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饥饿，我都没有从理论上怀疑过“集体化道路”。对于自60年代初重提“阶级斗争”再发展到十年“文革”灾难，造成生产队这个最基础的生产单位陷入混乱和无序，架着革命名义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使生产遭到数年的破坏。我尽管能看到这些问题，却仍然对“集体化道路”未曾产生怀疑。当80年代初实行责任制之初，我曾不无担心，单家小户如何实现机械化和水利化，等等。就在我自己躺在堆满小麦口袋上的那个夜晚，才把自少年时代就信奉不渝的理论淡释了。

时间过去近30年了，我的经历所引发的生活直感归于沉静。毛泽东在50年代农业合作化初期所写的大量“按语”，既坚信不疑又热情洋溢，几乎全是诗性的语言，这是我信奉“集体化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论基础。且不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话，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坚定的理论支持的信念，经过10亿农民近30年的实践，结果却是仍然由农民个体经营土地效果最好。我的心理感受很难归入“河东河西”那种感慨，又一时说不确切。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可靠，只是这个检验过程未免太长了。就我个人而言，从少年时期的信仰到整个青年时期投入的实践，却仅仅证明了这条道路的不可行。好在进入中年之后，我的专业转移到文学创作，那种体验和感受就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和价值。

邢小丽：中国的社会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从你上个月才去参观考察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起根发苗，你也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农村，你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是相当熟悉的，而且至今非常关注农村，研究农民。请你谈谈农村这三十年来的变化，包括生产经营上的、农村生活方式上的、农民文化心理上的变化。还有，你是如何认识农村城市化的。



陈忠实：中国的改革首先是由农村发起的。这是事实，也可以说业已成为历史。如果要问为什么改革会在相对落后的农村首先发生，我能想到的诸种因素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饥饿。在此之前的中国，城市人凭粮票吃饭，有的家庭尽管也存在口粮不足的现象，但毕竟有一个虽不宽裕却可以保证基本生活的粮食，做点稀稠搭配就可以从月头过到月末不致断顿儿。农村没有这个基本保证的粮票，全靠生产队土地上的丰歉，决定家家户户碗里的稀稠以及有无。决定土地每年丰歉的直接因素，除了自然灾害之外，便是生产队的管理和经营。仅以我生活和工作的号称八百里秦川的边沿灞河岸边的农村来说，最大的一种自然灾害是干旱，却不是年年发生，一般都是隔几年才有稍微严重的一次。在这方史称粮仓的渭河平原，口粮不足始终是一个困扰家家户户的最突出的问题。记得我在公社（乡镇）工作的十余年里，每到春二三月，近一半生产队的队长紧紧盯着公社，几乎天天跑公社找领导要救济粮。谁都明白，在这样好的条件下仍然吃不饱肚子，是生产队管理和经营不好致成的。不是个别而是普遍发生管理和经营不好的现象，且是一个持续始终的问题，就没有谁再敢深究了，只是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去解释，诸如未“突出政治”，没有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集体化”是中国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即使饥饿始终是一个难以改变的普遍现象存在着，也没有怀疑过“集体化道路”。不是胆量大小的事，确凿是一种理论的信仰。安徽小岗村的18个农民不仅怀疑了，而且做好了以生命为代价的挑战，私自实行土地分户经营。在这18户农民秘密分田到户30年之后的今年春天，我终于有机缘走进了小岗村。30年前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所干的事，早已通行全国所有乡村，今天听来看来颇觉不可思议。然而，在亲身经历过那个年月的我来说，却几乎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心情。我握着当年策划这场分田到户事件的生产队长的手时，是真诚的崇拜和钦佩。我想到我在分田到户第一年的情景，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分得了土地。第一个夏收的某个夜晚，我躺在堆积着装满麦子的口袋摞子上的时候，首先是一个农民的共同感觉，身下的这一堆麦子，足够畅畅快快食用三年，夏季一料收成